



## 对“一士兵失踪”的考证

——卢沟桥事变起因研究之一

曲 家 源

在卢沟桥事变起因问题的研究中，关于“第一枪”的文章连篇累牍，颇为可观，而对“一士兵失踪”问题却少有专题研究。但是，在卢沟桥事变起始的几个关键事件中，“士兵失踪”是远比“第一枪”重要得多且更复杂得多的事件，人们至今对它所知甚少；而且，这个事件到底包含着怎样的意义？我们也没有认真思考过。1987年我在《论卢沟桥事变的起因》<sup>①</sup>一文中曾进行过一些考察，指出：日军对“士兵失踪”一事前后态度不同，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此事引起日本一些史学家的注意。1988年江口圭一教授出版了新著《卢沟桥事件》，1989年安井三吉教授又发表宏文《关于卢沟桥事件中“一士兵失踪”问题的考察》，对此问题都进一步做出了探讨。江口氏说：一木最初不是以实弹射击而是以士兵失踪作为主要原因出动部队的。但到达现场一看，这个士兵已经回来，出动的理由已经不存在，已经没有和中国方面交涉的必要了。但是，一木并不把部队调回丰台，反之，为了“交涉”，首先占领一文字山。<sup>②</sup>安井氏说：

① 见《山西师大学报》1987年第2期。

② 江口圭一：《卢沟桥事件》第24页，岩波书店1988年12月版。





(7月8日凌晨)2点20分,北平特务机关也收到了小野口旅团副官“已清楚失踪士兵平安无事,我军无任何损害”的报告。因此,即使是旅团、特务机关也认为“失踪士兵”一事已完全解决。但小野口提出:“妨害日军演习,进行非法炮击,是对皇军的最大侮辱。要求最低限度:(1)师长道歉;(2)第三营立即撤退。”(《特务日志》第538页)这里只把“非法炮击”列为“对皇军的最大侮辱”。在此之前,“至少一本大队长为中心的上层人士,与其说关心中国兵的实弹射击,不如说更关心一士兵的生死——即首先关心的是士兵是否被中国兵的枪弹打死,这明显地使部队的应战态势提前了。”(寺平忠辅:《日本走向灭亡的序曲2 卢沟桥·深夜的枪声》)但向中方提出要求的证据,在此实现了由“一士兵失踪”到“非法炮击”的大转变。<sup>①</sup>

二氏对1937年7月7日深夜至8日凌晨日军向中国寻衅借口改变过程的论述,基本上是正确的。但遗憾的是,他们只是确认了“士兵失踪”事件实有其事和日军后来不把它作为交涉借口,始终停留在问题的表面。而重要的是,人们需要了解“士兵失踪”事件本身的情况以及这一事件在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到底起了怎样的作用?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按照江口、安井二氏所论证的过程,我们可以提出以下问题:

(一)依照日军中队长清水节郎《手记》所说,发觉“士兵失踪”以后,他向上级报告与搜索是同时进行的。对于在敌对的两军阵前发生“士兵失踪”这样极为敏感的重要事件,不作任何寻找努力,在真相完全不清楚的情况下,就确定为“失踪”,急不可待地向上级郑重报告,这是为什么?

(二)既然该士兵20分钟后即归队了,此后日军方面反复强调的却是“非法射击”对日军伤害得如何如何严重,那么,开始

<sup>①</sup> 安井三吉:《关于卢沟桥事件中“一士兵失踪”问题的考察》,《东洋史研究》第48卷第2号,1989年9月。





交涉的时候不把“士兵失踪”一事作为理由，也就用不着把此事通知中方，岂不更好？他们为何要多此一举呢？

（三）既然日军紧急出动是为了关心“失踪”的士兵，那么为什么日军对这位曾经“失踪”过的士兵讳莫如深，禁止人们了解他的情况？当时驻在北平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参加过日军的记者招待会，他记道：“日本人对于是否真有兵士失踪，不论在当时或后来都不会提供任何证据。在招待新闻记者时，我们问他们这事的详情，他们连说都不愿说起这一个兵士。”<sup>①</sup>后来日军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甚至完全否认曾把“士兵失踪”一事作为交涉理由提出过，这是为什么？

这一切都说明，在这个“失踪士兵”身上包含着某些隐秘的东西。要想了解卢沟桥事变起始的真实过程，必须对这一“士兵失踪”事件做进一步的考察。

## 二

关于日军最初以搜寻“失踪士兵”为理由向中国当局提出交涉的情况，因为日方后来改变理由，对此采取回避、否认的态度，所以我们只能从中国方面的资料中去了解。但是日方材料对此事也不是一点记载也没有，他们承认曾经发生过“士兵失踪”事件。我们以中方材料为主，参之以日方材料，可以了解此事件的基本情况。

卢变发生时的二十九军实际负责人、北平市长秦德纯在《七七卢沟桥事变经过》中记述事变起始是这样的：

七七之夜，约在11时40分钟，我接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任委员魏宗瀚及负责对日交涉的林耕宇专员电话，谓据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说：“本日有日军一中队在卢沟桥附近演习。但在整队时，忽有驻卢沟桥之第二十九军部队向其射击，因而走失士兵一名，并见该

① 埃德加·斯诺：《为亚洲而战》第14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士兵被迫进入宛平县城。日本军官要求率队进城检查。<sup>①</sup>

这里所说“日军一中队”、“整队时”、遭到“射击，因而走失士兵一名”各点，参之以日方的《清水手记》、《卢沟桥事件一周回顾座谈会记录》、《第一联队战斗详报》、《今井武夫回忆录》等材料，都是真实地记述了事件起始状况并且准确地传达了日方交涉要旨的。例如今井武夫在其回忆录中记述道：

……演习结束后部队正在集合，在晚上10点多钟，受到驻卢沟桥北边约1000米处的永定河左岸龙王庙附近的中国军队的实弹射击，最初数发，随后连续打了十几发。中队马上停止演习，点名时发现缺少一名士兵。当即进行搜索，同时向大队长报告，听候指示。<sup>②</sup>

在双方当事人互不交流的情况下，对同一事件记述得如此一致，说明事件确实是这样开始的。秦德纯所记的后两句话不见于日方资料，因为这两句话透露出日军挑起这次事件的目的所在，后来被他们极力抵赖，删去这两句话是意料之中的。但这两句话确实是有的，它反映了当时的真实历史过程。否则日军在北面回龙庙“听见枪声”、“士兵失踪”，却要进卢沟桥城搜索，就不近情理。正是这两句话才把“士兵失踪”与卢沟桥城联系起来，并且把此举的借口与目的联系起来。日军以这句话做铺垫，才能“理直气壮”地向卢沟桥城动武。秦德纯接着说：

夜晚2点，外交委员会又来电话，谓日方对我答复不满，强要派队进城检查，否则日军即包围该城。

秦德纯上述两次接林耕宇电话的情况，在《日军驻北平特务机关业务日志》上都可找到印证。《特务日志》记载：

午前0点30分，机关长亲自挂电话给外交委员会林耕宇委员，让他告诉解决事件的办法。

① 《七七事变》第1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②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3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





午前1时10分,林耕宇给机关长电话:秦市长已下令增加现场军队。

午前1时45分,林耕宇致机关长电话:为防止现场事态扩大,极力要求派遣中日双方代表到现场。①

秦德纯接电话后,立即把日军要求和秦本人的指示通知给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卢沟桥守军团长吉星文和宛平县长王冷斋等人。王冷斋对此也有清楚的记述。他在《七七回忆录》中说:

事变发生于(民国)26年7月7日夜间10时,日军一中队在卢沟桥附近实行夜间演习毕,集合回队时,突然扬言有日兵一名失踪,在宛平城外到处寻觅不见,意图进城搜索,并开枪数响示威。一方由北平日特务机关向我市政府及外交委员会交涉,谓日兵失踪定被卢沟桥驻军或该处土匪所害,应准日军进城搜索,如有其他情形,须由我方负责等语。②

王冷斋补充了日军对“失踪士兵”的判断,认定已被“卢沟桥驻军或该处土匪所害”,这就把“射击”、“失踪士兵”和卢沟桥驻军确凿地联系起来,以此为理由,要求加罪于中方,是可以充分强硬的。

王冷斋的这篇回忆录写于1938年,其时距事件发生不久,尤其是他还参照了事变当时自己写的有关笔记和《纪事诗》,所述各点应该说是真实可信的。

关于日军当初要求进卢沟桥城搜查“失踪士兵”事,在秦德纯、冯治安、张自忠三人致军政部长何应钦的电报中也有详细记载:

(1)庚夜12时,日军一中队在卢沟桥城外演习间,借口闻有枪声,当经收队点名发现缺少一名。(2)日本武官松井认为枪声系由卢沟桥城边所起,要求率队进城搜查。(3)我驻卢部队以值深夜,日兵入城足引起地方不安,且我方官兵正在睡眠,枪声非我方所发,当经拒绝。该武官以我方不允即令日军向卢沟桥城取包围形势。经与日方

① 译文引自《北京档案史料》1989年第1期,译者吴玉林。

② 《抗战建国第一年》,七七书店1938年版。



商定双方派员前往调查。(4)日方所派之寺平副官佐到达卢沟桥城后,仍坚持日军入城搜查……①

这封电报是7月8日下午5—6点钟时——即事变当天下午发出的。它以发电人处于事件中心的权威性和发电时间的及时性而具有不容置疑的史料价值。当时中国各大报纸新闻栏及中央社电讯都基本以这封电报所记述的事件过程为准,发出了各自的消息和评论。应该说,这是卢沟桥事变起始的真实状况。

从日军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开始向中方提出进城搜查“失踪士兵”的交涉起,日军的全部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就是进占卢沟桥。“失踪士兵”归队以后,8日凌晨4时,寺平忠辅在卢沟桥城外向王冷斋提出,要求允许他带日军一中队附机枪一小队占据卢沟桥东门内;8日中午,日军代理联队长森田彻向中方代表提出最后通牒:限晚6时前,“中国军队移至永定河西岸,一木大队移至河东岸,两军隔离。否则解除其城内武装”②。这些岂不是威胁中国军队把卢沟桥拱手让给日军?这些无理要求被拒绝后,9日凌晨,日军又逼使中方同意撤出军队,卢沟桥城防由保安队担任,把卢沟桥地区实际变成冀东22县那样的“非武装区”。用日军的这一行动目的来考察他们最初提出的借口,可以断定,“士兵失踪”问题必定是他们最振振有词的理由,只有利用这个问题才足以提出进城的要求。以“失踪士兵”为中心,引起卢沟桥事变发生的三个关键问题(“射击”、“士兵失踪”、进城搜查)才有了内在的逻辑联系:射击的枪声是为“士兵失踪”制造的环境条件,搜寻“失踪士兵”是要求入城的最有力借口,而进占宛平城正是日军此举的直接目的。正因为日军提出交涉的理由是进城搜查“失踪士兵”,才一开始即引起中国当局的警惕,被严辞拒绝: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七七事变至平津沦陷蒋何宋等密电选》,《历史档案》1985年第1期。

②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第134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卢沟桥是中国领土，日本军队事前未得我方同意在该地演习，已违背国际公法，妨害我国主权，走失士兵我方不能负责，日方更不得进城搜查。<sup>①</sup>

日军企图利用进城搜查的机会轻取卢沟桥的阴谋碰了壁，这才引起冲突，事变发生了。

### 三

7月7日深夜，日方向中方提出交涉以后不久，就自动把“士兵失踪”问题从交涉中撤销了。日方在交涉开始时到底提没提“士兵失踪”问题，成为中日间争论的又一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当时负责与中方交涉的日军北平特务机关是否知道“士兵失踪”一事以及他们对此事的态度。

首先应该回答：北平特务机关是知道此事的。《特务日志》电话记录中有如下记载：

7月8日午前0点10分，河边旅团的小野口副官电话：丰台部队第八中队在卢沟桥龙王庙附近进行夜间军事演习，午后11时突然遭到中国军队18发子弹的射击。中队长清水节郎大尉立即率队应战时，发现一新兵失踪。目前双方正在对峙中。<sup>②</sup>

在两军阵前发生“士兵失踪”事件，作为华北日军外交情报主管部门的特务机关不会不予以重视。《特务日志》又记：“0点20分，牟田口联队长电话，向机关长报告了有关卢沟桥事件情况。”牟田口报告的“事件情况”中肯定应包括“士兵失踪”问题；而由牟田口报告，说明对“士兵失踪”非常重视，这促使松井在0点30分亲自挂电话给林耕宇交涉。松井要林“马上告诉我

① 秦德纯：《七七卢沟桥事变经过》，载《七七事变》，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② 译文引自《北京档案史料》1989年第1期。





解决事件的办法”。联系中方的资料可知，这个“事件”即应为“士兵失踪”事件，“解决办法”即允其“强行带队进城搜索”。

但是，松井很快又得到报告，“失踪”士兵已安全归队，进城搜索的借口已经不复存在。但他仍指令部下坚持进城要求，由此又引起另一桩争执不已的疑案。据王冷斋在其回忆录中说，他参加调查团乘汽车到达卢城东北角沙岗<sup>①</sup>时，此处已被日军布为阵地。日特务机关辅佐官寺平忠辅手持地图向他提出：

现在事态已十二分严重，不及调查谈判，应请贵员迅速处理，下令城内驻军向西门外撤退，日军进至东门城内数十米达地点，再行谈判。<sup>②</sup>

寺平并且说：“此项要求系奉命办理，势在必行。”

王冷斋、林耕宇等中方代表在北平日特务机关部与松井谈判的，是日军能否进卢沟桥城搜查“失踪士兵”问题。寺平是松井的代表。对于寺平在卢沟桥城外提出的进城要求，中方代表理所当然地理解为要“强行进城搜查失踪士兵”。当这一经过在中国报纸上公布以后，寺平曾拿着报纸向林耕宇提出“抗议”，说这一过程是林“捏造”的。寺平在其回忆录《卢沟桥事件》中说：

我和樱井顾问根本没有要求搜查已归队的士兵。<sup>③</sup>

寺平在这里玩弄了一个偷换概念的花招：他说“没有要求搜查已归队的士兵”，但他没有说明他是否要求带日军进城以及进城做什么。如果说为搜查“失踪士兵”而要求进城是使侵略蒙上一层

① 沙岗即日军所称之“一文字山”。那是一木清直随心所欲起的名字。日本侵略军随意篡改中国地名的还有：“龙王庙”应为回龙庙，“西五里店”应为五里店。本文在引述日方资料时仍用日人称法，以存原貌。

② 王冷斋：《七七回忆录》，载《抗战建国第一年》，七七书店1938年版。

③ 寺平忠辅，《卢沟桥事件》第439页，读卖新闻社1970年版。







“文明”伪装的话，那么，任何理由也不讲就强行要求进城，就是赤裸裸地撒野了！

关于寺平要求允许日军进占卢沟桥城东门内一事，《第一联队战斗详报》中是有记载的：

7月8日午前2时，联队长表示……适当地派步兵一个中队、机枪一个小队与冀察方面调停委员同时进入卢沟桥东门内。<sup>①</sup>

江口圭一在其《卢沟桥事件》中谈到这件事时说：“中国方面的报道，是把日军要求在东门内配置这件事故意偷换或是由于不注意而误解、误报为要求搜索城内。”<sup>②</sup>不知道江口教授是衡量不了“在东门内配置”与“搜索城内”孰轻孰重，还是认为“日军要求在东门内配置”是正当的，已失去了是非之心？中国是被侵略者，让敌军在“东门内配置”与“搜索城内”对中国的损害是同样的，有什么必要“偷换”或“误解”？无论是在“东门内配置”还是“搜索城内”，都表明日军要进占卢沟桥城。前文已经说明，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完全是由于日本当事人心怀鬼胎，他们偷偷改换了交涉理由，但并未把改换的情况向中方正式交代。这件事只是又一次证明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蛮横霸道，怎么可以反倒责备中国方面呢？

更为恶劣的是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竟然干起了食言自肥的把戏。战后他把自己很强硬说过的话竟然否认得一千二净，

士兵在城外演习中失踪，尽管如此，但若使用武力进城搜索，这种事蛮横的事，从常识角度考虑，也可以说没有道理。这一定是担任联络的林耕宇不辨现场情况，临时那样捏造，报告给秦德纯的，或者是秦德纯本人那样捏造的。

为了调查事情真相，防止冲突，我打电话给林耕宇，只请派人赴

①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第132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② 江口圭一，《卢沟桥事件》第34页。





现场，根本没要求进城搜查士兵。<sup>①</sup>

松井可能以为他是通过打电话提出进城搜查“失踪士兵”这一要求的，没有留下什么凭据（《特务日志》中全然没有记载），因而可以全部否认。但是他否认得太彻底了，难免顾此失彼。试想，松井身为华北日军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北平特务机关长，对“士兵失踪”事根本不过问，不是太失职了吗？安井三吉对此时的松井太一郎提出这样的疑问：

在凌晨0点30分—1点45分这段时间里，松井最关心的事应该是“失踪士兵”去了何处？如何才能找到？而且在“失踪士兵”与第二十九军有关这一前提下，无疑给林耕宇是打过电话的。《特务日志》中虽有“处理事情办法”，“防止事态扩大”，但当时最关心的找回“失踪士兵”这个内容，竟完全没有涉及，这反而使人产生疑问。<sup>②</sup>

这是对松井谎言的有力批驳。事实上日军当时所说的“看见该士兵被迫进入卢沟桥城”、“失踪日兵定被卢沟桥驻军所害”、“要求率队进城搜查”等等，都是松井提出的。松井的抵赖使他陷在或者承认“要求进城搜查士兵”，或者承认失职，这样的两难之中，二者必居其一。

松井提出过进城搜查“失踪士兵”的要求是赖不掉的，这不仅有他的谈判对手中国当事人的证言来证明，而且我们还可以举出另外的一些证据。例如当时日本驻北平总领事森岛守人，他于1937年7月14日抵达北平上任，正遇到卢变。作为总领事，他当然知道事件的全过程。他在回忆录中说：

至于当地驻军在作法上，在没有充分调查的情况下，就提出进入

① 见寺平忠辅《卢沟桥事件》第438页引，读卖新闻社1970年版。

② 安井三吉：《关于卢沟桥事件中“一士兵失踪”问题的考察》。



宛平县城搜查的要求等，不可否认都是一种轻率的举动。<sup>①</sup>

森岛是站在阴谋圈子以外进行批评的，所以仅看到“轻率”，而不知道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计划行动。但他明确肯定了松并要求进城搜查确有其事。

在辨明当年华北日军在“士兵失踪”问题上的种种伎俩之后，我们不难看出，开始那样气势汹汹提出，后来又如此千方百计遮掩，这“士兵失踪”事件背后肯定隐藏着某种不可告人的东西。松井太久郎弄巧成拙，他吸引我们把目光转移到“失踪士兵”志村菊次郎身上去。

#### 四

引起如此重大冲突的“士兵失踪”到底是怎样的情形？原来他既未被中国兵捉进卢沟桥城，也未被中国兵打死，而是在“失踪”20分钟以后自己“归队”了。20分钟是很短暂的时间，但是在几十年时间里，竟然谁也没有弄清志村菊次郎在这20分钟里做什么去了。事变当晚第八中队有135名军人，他们在战争结束时还有几个幸存者，但也没有一个人能说清志村“失踪”的情况。第八中队长清水节郎在战后给《日中战争史》作者的一封信中，是这样解释“士兵失踪”的：

为什么因为大便而没有马上来参加集合？对此点在我的记忆中也感到模糊。他是否由于传令侦察而迷路，在返还原来位置时，所属队已经移动，天黑了，他回到原来位置已经晚了。或者是躲起来睡觉，或真如所说的离开中队演习地（是不许可的）而去大便，即使听到了预定的演习中止号音，知道接着是休息因而漫不经心。纵然这一切都是事实，但不可能象《详报》那样载入文件，以免留存于后世，成为他本人终生的耻辱。<sup>②</sup>

① 森岛守人：《阴谋·暗杀·军刀——一个外交官的回忆》第134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② 见秦郁彦：《日中战争史》第173页，河出书房新社，1961年。



清水节郎在说这些羞辱性的话的时候，“失踪士兵”志村菊次郎已经不在人世，他无法出来为自己辩白。我们对此可以提出这样两个问题：

（一）清水节郎是志村菊次郎的上司，他有权更有责任在志村归队后弄清他“失踪”的情形，但清水为什么要在这里不负责任地胡疑乱猜？他举出这样多的假设，但用20分钟时间来限制一下，没有一种是真正可能的。

（二）志村如果是因为普通原因而未经请假擅自离队，那么，不论这原因多么重大，也是可以讲出来替自己辩解的。但是，他为什么宁可忍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而在此后几年中一直缄默不语？

这表明，二等兵志村菊次郎的“失踪”绝不是一件寻常的失踪事件，他身上一定负有某种特殊的使命。严静文先生推断，“他有可能当七七之夜受某一长官暗示，传令时中途装作失踪”<sup>①</sup>，是有道理的。

负担挑起卢沟桥事变任务的日军第八中队，基本是秋田县人组成的。志村菊次郎是入伍才三个月的新兵。关于他的情况，我们仅知道“失踪”事件发生后不久，他即离开部队，回到了家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1年12月，他再度被征入伍，派到缅甸作战。1944年1月31日，在阿拉干山区布其顿附近被打死<sup>②</sup>。

志村菊次郎的遭遇中有许多反常之处。这些反常处都与日军策动的卢沟桥事变有关。第一，他是在特殊的政治情势下，在不可能发生失踪问题的时间、地点“失踪”的。他的“失踪”必有特殊的原因。只有“受人指使，把失踪作为一项任务去执行”，才能解释通他的“失踪”问题。联系松井向冀察当局所提出的交涉内容，可推知志村的任务是：听到枪声后即悄悄向卢沟桥城靠拢，引起华军骚动，或被华军捉进城去，或被华军打死，

①② 严静文：《七七事变谁先开枪的问题一驳若干日本历史学者的谬说》，香港《明报月刊》第8卷第7期。





然后日军出动交涉。

第二，他离队时间太短，其实并未失踪，“失踪”云者，是清水、一木等人强加给他的。但他知道自己有意未完成任务犯了大错，他更不敢泄露所负使命的秘密，所以他无法对各种责难做出辩解。

第三，他的被冷落就是对他未完成任务的惩罚：在其他士兵都能“报效天皇”，并且借助战争可以抢掠被侵略人民财物的时候，他却被贬斥回乡，断了“尽忠”和发财的路。后来在战争扩大、兵员紧缺的时候又被拉了出来，直到被打死，走完了他倒霉的一生。

从志村菊次郎的遭遇，我们约略可以看出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策划卢沟桥事变阴谋的大致轮廓。这个阴谋计划原来是按这样步骤安排的：

(1) 放枪—→(2) “士兵失踪”—→(3) 提出进城搜查交涉—→(4) 进城搜查，发现日兵或日兵尸体—→(5) “膺惩”二十九军，占领卢沟桥—→(6) 逐二十九军出平津、河北，解决华北“悬案”。

这个计划的巧妙之处在于，日军确有士兵失踪，二十九军无理拒绝日军进城搜查，而只要日军进城，无论发现日兵是活人或死尸，中方都无法辞其咎。而以此证明中国军队“暴戾”，煽动日本国内舆论，肯定会得到举国一致的支持。

但是，这个计划由于第二步“士兵失踪”未执行到底而被打乱，于是临时把计划改为：

(1) 放枪—→(2) 改为抗议“非法射击”交涉，直接要求带队进城—→(3) 抢占卢城—→(4) 驱逐二十九军出平津、河北。

改变计划的时间，应该是在一木率大队到达卢沟桥城外听到士兵“归队”消息以后，至2时20分小野口给松井打电话之间。但由于中方仍拒绝日军进城，于是他们再临时变更计划为要求中





国驻军退出卢城。再次遭到拒绝，日军只好拿出最后的办法，全面攻击南苑、通州、卢沟桥、廊坊等地，武力驱逐二十九军出平津。按照原计划，如果执行顺利的话，平津原有的一个旅团兵力已能够胜任。但实际情况出乎意外，特别是二十九军的坚决抗战，使日军的计划一再变更，并不得不拖延时间以等待从关东军、朝鲜军和本土调来的援军。这一切，虽然从执行计划来说，日军步步碰壁，基本失败了；但日军依靠陆续增加的强大军力，他们的目的在7月28日终于达到，中国华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北平、天津被全部占领了。

## 五

由上面的论述，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士兵失踪”事件不是偶然发生的可有可无的小插曲，而是侵华日军事先安排好的行动计划中重要一环。通过这一事件可以窥见日军计划的概貌。从日军计划的角度来看卢沟桥事变中许多不可解的奇怪现象，由此都可作出合理的解释。例如清水节郎对“失踪士兵”归队的消息为何要拖延三个多小时才报告的问题。开始，他听见枪声，尽管他清楚地知道“敌弹在头上飞得相当高，大概不致有人被伤害”<sup>①</sup>，但他仍立刻集合点名，果然发现一名士兵“失踪”。他又立即迫不及待地派人向上级正式报告。这都是在执行计划。对他为何不等待搜索结果也就明白了。但志村归队却出乎意料之外，把计划打乱了。他没有马上报告，因为，事关重大，清水既不能再派人去向大队长解释（机密不可外泄），自己也无法决定采取何种步骤应付局面，只好把部队撤出现地到五里店待命，直到一木到来之后才报告此事。根据事情的意外性，清水只能这样处理。因此，日军上级机关没有追究他的迟延报告责任。再如，没有任何人看见志村菊次郎被中国

<sup>①</sup> 秦郁彦：《日中战争史》第166页。





军队捉进城去或杀害，但松井却向中方说日兵已被捉进城去并杀害掉，口气肯定，态度强硬，要武力进城搜查。松井这些话，不是猜测之词，他也是按原计划说的。后来他完全否认说过进城搜查的话，正是为了掩盖阴谋计划的暴露。

（二）但是，志村菊次郎并未按原计划“失踪”，他半途即转回来，这造成了下述后果：甲、原计划被破坏，不得不临时对原计划进行补苴，使日军丧失了最有力的进城借口。乙、日军行动的计划性被暴露，使松井、寺平等日方谈判代表陷入被动境地，一再为自己开始时向中方提出进城搜查“失踪士兵”的要求进行辩解。

（三）从把“士兵失踪”作为交涉理由，可以看出日军计划的目标是占领卢沟桥。所以当“进城搜查失踪士兵”的要求由于志村的归队而失效以后，日军就不要理由，露出狰狞面目，炮轰卢沟桥，从而引发了卢沟桥事变。

（四）志村菊次郎是在开始执行“失踪”任务以后自动停止“失踪”的。他中止的原因可能有许多种，但不论志村中途归队的主观动机是什么，客观上他却为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阴谋的正义事业做出了贡献。可以设想，如果志村当时真的按原计划走入卢沟桥城或被打死，那后果该是什么？那样的话，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策划的卢沟桥事变阴谋就会蒙上一块“有理”的遮羞布，使人们永远无法弄清其真相。从这个意义上说，志村菊次郎，这是一个中国人民应该记住的名字。

（责任编辑：曾景忠）

（作者曲家源，1936年生，山西师范大学学报副编审）

